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中



一、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

中国从 1840 年鸦片战争之后，就开始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此长期在资本主义列强的压迫和欺辱下艰难挣扎。

在包围中国的列强之中，有一个虽然后起，然而却对中国虎视眈眈的国家，这就是中国东面隔海相望的邻国——日本。

日本在 1868 年明治维新以后，完成了向资本主义时代的过渡，从此迅速强盛起来。

日本工业的发展，需要在海外寻求原料，开辟市场。日本政府鉴于帝国主义列强在远东激烈争夺的形势，决定以“大陆”政策作为国策，努力向亚洲大陆谋求发展。

1894 年（清光绪二十年），朝鲜发生东林党起义，清王朝应朝鲜政府之请求，派兵入朝。羽翼逐渐丰满的日本早已觊觎朝鲜，并且企图借朝鲜内乱的机会向中国挑衅，于是也立即派兵进入朝鲜，与清军对垒。在尚未宣战的情况下，日军击沉了中国运兵的商船，迫使清军应战。在平壤设防的清军在日军进攻下战败，被迫渡鸭绿江回国。日军突破鸭绿江防线，占领辽东，攻陷旅顺，血洗全城。在威海卫之战中，清政府的海军主力北洋水师全军覆灭。按中国干支纪年，这一年是甲午年，这场战争，于是称作甲午战争。1895 年 2 月，李鸿章赴日签订《马关条约》，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将辽东半岛、台湾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中国“赔偿”日本军费银 2 万万两。

在帝国主义企图瓜分中国的狂潮中，日本将福建作为它的势力范围。

1900 年，为了镇压义和团，日本军队又加入八国联军，从大沽口登陆，相继攻占了天津、北京。进攻北京的各国联军总兵力一共约 2 万人，而其中日军竟然多达 8 千人。

1904 年到 1905 年，日本和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进行了历史上称作日俄战争的帝国主义战争，战后，日本取代了沙俄在中国东北的支配地位。

20 世纪初，中国有见识的爱国者都清醒地看到了日本对于中国的威胁的严重性。

1915 年 1 月，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无理要求，企图把中国的领土、政治、军事以及财政都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5 月 7 日，日本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限 48 小时内应允。

日本的狂妄与蛮横，激起了中国人民强烈的义愤。

1915 年夏季，毛泽东所在的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师生出于爱国热情，自发刊印了题为《明耻篇》的有关中日关系的文件汇编。毛泽东在书后的题跋中，记述了当时“当中日交涉解决之顷，举校愤激”的情形。在书的封面，毛泽东又题写了这样几句话：

五月七日，
民国奇耻；
何以报仇，
在我学子！

从题字的笔迹看，端正严整，沉稳有力，透露出一个爱国青年决心为国家为民族雪耻报仇的坚定意志。

1916 年 7 月 25 日，毛泽东在致友人萧子升的一封信中，又针对日本帝

国主义灭亡中国的企图，表抒了爱国的激情，同时以高度警觉的笔调，谈到了对日本这一“我国劲敌”，决不能“沉酣”而不“注意”。毛泽东写道：

思之思之，日本诚我国劲敌！感以纵横万里而屈于三岛，民数号四万万而对此三千万之为之奴，满蒙去而北边动，胡马骎骎入中原，况山东已失，开济之路已为攫去，则入河南矣。

青年毛泽东认识到日本是中国的“劲敌”，他深切感叹拥有民众“四万万”的中国，竟然有可能面对只有“三千万”人口的日本而“为之奴”！他又写道：

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而国人犹沉酣未觉，注意东事少。愚意吾侪无他事可做，欲完自身以保子孙，止有磨励以待日本。

毛泽东认为，20年之内，可能将有一次中国救亡图存的对日战争，他希望国人多注意日本的动向，主张青年一代应当完善自身，磨练意志，以迎接不可避免的和日本的决战。当时22岁的毛泽东甚至预见到在未来的对日战争中，美国可能是中国的盟友。他赞赏美国政治家的“雄奇迈往之气”，预言美国将与中国共同进行对日战争：

愚意此刻非彼用武之时，欧洲非彼用武之地。彼之时，乃十年以后；其地，乃太平洋耳。日美战争之说，传之已久。十年之后，中国兴会稽之师，彼则仗同袍之义，吾攻其陆，彼攻其海。既服三岛，东西两共和国亲和接近，欢然为经济食货之献酬，斯亦千载之大业已。

他甚至预想到未来太平洋可能将成为美国“仗同袍之义”，协同中国对日本作战的主要战场。

历史正如毛泽东所预想的，在20年后，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爆发了！

1931年9月18日，日军驻中国东北的关东军突然袭击沈阳，以武力侵占了中国东北。

这就是“九·一八”事变。

在中国军队执行不抵抗政策的情况下，日军迅速占领了东北三省。“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开始。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又在淞沪地区和长城地区进行武装侵略，并且在华北地区制造所谓“特殊化”。1935年，驻华日军为了进一步侵略中国，策动华北各省脱离南京中央政府，实行“自治”。历史上将日军为此而制造的一系列事件称作“华北事变”。

以毛泽东为主要领导人之一的中国共产党，在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灭亡中国的严重形势下，呼吁国民党立即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并且领导或协助一部分东北爱国军队组成东北抗日义勇军和东北抗日联军，进行游击战争。在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和帮助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又称“察绥抗日同盟军”）也进行了积极的抗日武装斗争。

1935年8月1日，红军正在长征途中，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揭露日本企图灭亡中国的野心，指出中华民族正处于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号召全中国人民动员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935年12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声势浩大的“一二·九”运动，全国的抗日运动进入了新的高潮。1936年2月，到达陕北不久的红一方面军为了推动抗日救亡运动，打通开赴抗日前线的通路，在

毛泽东率领下渡黄河东征。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逼迫蒋介石抗日。中国共产党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推动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团结抗日创造了条件，实现了由国内战争向全国抗战的伟大转变。

1937年7月7日夜，驻丰台的日本华北屯驻军在卢沟桥附近进行军事演习，宣称1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中国军队驻地宛平城搜索，遭到中国军队拒绝。8日拂晓，日军向宛平城射击，中国守军第29军奋起抗击。

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后，中共中央在7月8日发布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军的侵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军的新进攻。

同一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电令第29军军长宋哲元，应当以不屈服、不扩大的方针，就地抵抗。

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指出：“最后关头已到，我们只有抗战到底。”

8月13日，日军突然向上海的中国守军发动进攻，中国军队奋起还击，淞沪抗战爆发。

第二天，国民政府发表声明，宣布：“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

15日，蒋介石下达总动员令，将全国临战地区划分为5个战区。

25日，根据国共两党的协议，主力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10月12日，南方八省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两支军队改编后，立即开赴华北、华中抗日前线。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结成。国民党任命朱德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聘任周恩来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国民参政会成立之后，毛泽东等7人被聘请为中国共产党方面的参政员。

于是，全国呈现出一派团结抗日，齐心救亡图存新气象。

二、兵民是胜利之本

在延安城西北角的凤凰山下，有一处毛泽东故居。

当你来到这里参观时，讲解员会给你讲述这样一个故事：

1938年春季，毛泽东正在夜以继日地写作一部关于指导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的著作，在最紧张的时候，他甚至一直连续工作了两天两夜。陕北的初春，寒风刺骨，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把他的饭菜热了一遍又一遍，他仍然专心地写作，一直顾不上吃。有一次，火盆中的炭火烧着他右脚的棉鞋，毛泽东竟然丝毫没有觉察，仍然在静静地沉思，直到火苗把鞋烧穿了一个大洞，他才感觉到剧烈的灸痛。

这双烧坏了的棉鞋，至今还陈列在当地纪念馆里。

毛泽东当时写作的这部书，就是1938年5月至6月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发表的讲演，著名的《论持久战》。

当时，在抗日阵营中，关于对日作战的方向和前景，存在着不同的认识。一种意见，被称作“亡国论”。

持这种意见的人们认为，中国会亡，最后胜利不是中国的。

另一种意见，被称作“速胜论”。

持这种意见的人们认为，中国很快就能打败，无需乎费大气力。

毛泽东指出，“亡国论”是不对的，“速胜论”也是不对的。他写道：“于是问题是：中国会亡吗？答复：不会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中国能够速胜吗？答复：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

抗日战争发展的历史事实，证实了毛泽东的论断是正确的。

从抗日战争是持久战的论点出发，毛泽东又指出了如抗日战争这样的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

毛泽东说：“兵民是胜利之本。”

他还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面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八路军和新四军积极配合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的作战，深入敌后，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创建了许多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

1940年8月到12月，华北地区的八路军部队发动了“百团大战”，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军。参加这一战役的八路军共有104个团，歼敌3万余人，破坏了正太路 and 同蒲路、平汉路、石德路等铁路交通线，一度攻占娘子关，收复五六十个县，最后得到巩固的县城还有26个以上。

胜利的消息传到延安，毛泽东高兴地致电指挥这一战役的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说道：“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组织一两次？”

刊登在1940年的《八路军军政杂志》上的这样一首诗，赞颂了百团大战的辉煌胜利：

青天霹雳太行头，

万里阴霾一鼓收。
英帅朱彭筹此役，
竟扶危局定神州。

蒋介石在 1940 年 9 月 11 日也致电朱德、彭德怀，说道：“贵部窥此良机，断然出击，予敌甚大打击，特电嘉奖。”当时重庆的《新蜀报》上为八路军的胜利还载文：“这次持续如斯，范围如斯广大的敌后战争，是怎样的雄伟，我们数十万将士驰骋北方原野，是如何自傲与艰辛，我们每天看到如雪片飞来的条条捷报，真是要兴奋感动得流泪！”

彭德怀后来回忆说，抗日时期，人民战争有了发展，比红军时期进了一步。如大规模的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等多种多样的战法，各种各样的武器都加以利用了。武装编组也是多种多样的。如普通民兵、基干民兵；村乡有小组、区有区干队、县有独立团、营或支队。在百团大战之后，还发展了武装工作队（武工队），它是党、政、军、民统一的组织形式，他们的一般政策水平比较高，善于分析具体情况；他们对每一个斗争对象非常灵活机动，处处为人民利益着想，把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结合得特别巧妙。这些都是在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指引下，逐步成长起来的。

在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阐述人民战争思想的重要著作，还有《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毛泽东还直接对八路军和新四军的部署、行动和作战进行规划、指挥。

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在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军曾经有比较积极的表现。国民党可以用于第一线的兵力约 100 万，全部投入正面战场，有效地消耗日军有限的兵力，粉碎了日军所谓“速战速决”，期望在 3 个月内灭亡中国的战略。在一系列的会战中，国民党军广大爱国将士创造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

作为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的毛泽东，站在中华民族共同利益的立场上，对国民党军英勇抗战的精神，也表示深深的钦佩和由衷的敬仰。1940 年 5 月，第五战区右翼兵团总司令、抗日名将张自忠在襄樊保卫战中，身负重伤，仍与日军苦战，最终以身殉国。毛泽东所致挽词为“尽忠报国”。

1942 年 3 月，日军进攻缅甸，英国守军告急。应英国政府请求，中国以陆军第 5、第 6、第 66 军组成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第 5 军当时是中国军队中唯一利用苏联援助和美国援助武装起来的机械化部队。200 师师长戴安澜率部与日军艰苦奋战于同谷，弹尽粮绝后不得不放弃。戴安澜在棠吉攻坚战突围时，腹部和胸部各中一弹，不久去世。当时年仅 38 岁。毛泽东在延安为戴安澜作挽诗：

外侮需人御，
将军赋采薇。
师称机械化，
勇夺虎罴威。
浴血东瓜守，
驱倭棠吉归。
沙场竟陨命，
壮志也无违。

诗中所谓“将军赋采薇”中说到的“采薇”，是指《诗经·小雅》中的

《采薇》一篇。这是一篇记述军旅生活的古诗，其中“忧心烈烈，载饥载渴”等诗句，描述了古时壮士为国远征，备极艰辛的情形。

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

有不少回忆文章，都说到毛泽东和延安军民一起，在现场聆听著名音乐家冼星海亲自指挥的《黄河大合唱》的情形。

“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

雄壮的歌声，表达出中华民族奋起抗敌的英雄气概。

当时民族精神的空前振奋，是以爱国主义情感的空前高涨为基点的。

我们的国家，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形成了基础比较稳固的文化共同体。我们的民族，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形成了凝聚力比较紧密的文化特色。

可以说，我们民族的爱国主义意识，是有悠久的历史传统的。

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活动和文化活动，都十分注重继承这种具有积极意义的历史传统。

在延安往西安的途中，有一座翠柏围簇的高山，这就是桥山。传说中华民族的先祖黄帝的陵墓就在这里。

汉代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的史学名著《史记》中，第一篇就是记述传说时代“五帝”事迹的《五帝本纪》，而有关黄帝的传说，列在这一篇的最前面。黄帝，很可能是原始氏族社会晚期活动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一个强大的部落联盟的领袖。黄帝和另一位部落联盟领袖炎帝，一同被尊奉为我们民族的始祖。海内外中华儿女，都自认为是“炎黄子孙”。

据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的记载，“黄帝崩，葬桥山。”就是说黄帝逝世之后，埋葬在桥山。

桥山所在的地方，原来称中部县，后来改称黄陵县。

1937年清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特派林伯渠祭扫黄帝陵，毛泽东起草了《祭黄帝文》，颂扬这位被称作“人文始祖”的传说人物，同时，颂扬了我们中华民族奋发进取的光荣传统，颂扬了我们中华民族数千年来所创造的灿烂文明。

毛泽东写道：

中华民族，氏族轩辕。

黄帝之陵，田田。（原稿如此）

赫赫始祖，吾华肇造。

胄衍社绵，岳峨河浩。

聪明睿智，光披遐荒。

建立伟业，雄立东方。

毛泽东回顾黄帝的辉煌战功，鼓励他的后人奋起抗战，不能让国家民族蒙辱：

懿维我祖，命世之英。

涿鹿奋战，区宇以宁。

岂其苗裔，不武如斯。

泱泱大国，让其沦胥。

历史的演进多有起伏反复，到了近世，日本帝国主义的威胁又导致了深重的民族危机，“世变沧桑，中更蹉跎。越数千年，强邻蔑德。”毛泽东接着又以慷慨激昂的气势，发表了不畏艰苦牺牲，保卫民族文化的誓言：

东等不才，剑履俱奋。

万里崎岖，为国效命。

频年苦斗，备历险夷。

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经过万里长征，备极艰辛，就是为了北上抗日。这里所说的“匈奴未灭，何以家为”，是借用了汉代名将霍去病的故事。霍去病率军抗击匈奴，远征大漠，战功累累。汉武帝要为他营造华丽的宅第，请他前往视察，他却说，“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也！”表现出决心在击破敌国之后再经营个人的小家的志向。毛泽东在这里用了这个典故，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一切爱国者在大敌当前的时刻先国后家，奋死抗战的精神。

毛泽东在祭文中还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发动全国民众抗战的主张：

民族阵线，救国良方。

四万万众，坚决抵抗。

他还写道：

还我河山，卫我国权。

此物此志，永矢勿谖。

经武整军，昭告烈祖。

实鉴临之，皇天后土。

1937年3月29日，毛泽东将这篇祭文寄给著名记者范长江，期望可能时予以发表。《祭黄帝文》后来是由毛泽东和朱德联名发表的。

读了这篇文采焕然的祭文，人们都会为我们民族的光辉历史而感到自豪，都会为能够投身于英勇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斗争而感到光荣。

1935年12月5日，也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1周之前，毛泽东在给杨虎城将军的一封信中，也以激切热烈的笔调，抒发了强烈的爱国热忱。他写道：

抗日反蒋，势无偏废。建义旗于国中，申天讨于禹域。驱除强寇，四万万具有同心；诛戮神奸，千万年同兹快举。……重关百二，谁云秦塞无人；故国三千，惨矣燕云在望。亡国奴之境遇，人所不甘：阶下囚之前途，避之为上。冻霜

遍地，勉致片言，风雨同舟，望闻明教。

他以恳切的言辞，表达了为了抗日救国，“愿求同志”，“联镖并进”，如此则“河山有幸，气势更雄”的热诚期望。

1939年冬季，毛泽东和其他几个在延安的同志合作写作了一个课本《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其中的第一章《中国社会》，是其他几个同志起草，毛泽东修改定稿的。在第一节《中华民族》中写道：“我们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从很早的古代起，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衍在这块广大的土地之上。”中国地理上的国际环境，给予中国人民革命造成了外部的有利条件和困难条件。“困难的是：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其和中国接近的关系，时刻都在迫害着中国各民族的生存，迫害着中国人民的革命。”

在这个课本中，毛泽东等人以饱满的爱国主义热情，颂扬了我们民族文化的光荣。他们写道：“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在很早的时候，中国就有了指南针的应用。还在一千八百年前，已经发明了造纸法。在一千三百年前，已经发明了刻版印刷。在八百年前，更发明了活字印刷。火药的发明，也在欧洲人之前。所以，中

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已经有了将近四千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在中华民族的几千年的历史中，产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所以，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还写道，从鸦片战争到现在的抗日战争，都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中国人民，百年以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使得帝国主义至今不能灭亡中国，也永远不能灭亡中国。”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组成部分。

1939年9月，德国向波兰发动军事进攻，英、法等国向德国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1941年12月7日（夏威夷时间），日本海军突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8日，美国、英国对日本宣战。9日，中国政府正式对日本宣战，同时声明对德、意两国处于战争状态。太平洋战争爆发。1942年1月1日，中、美、英、苏等26国在华盛顿签署了对轴心国共同行动的宣言，结成了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次日，蒋介石接受同盟国的推举，提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指挥本战区的盟军部队共同对敌作战。中国战区成为太平洋战争的主要战场。

在太平洋战争进行期间，美国和英国出于牵制日本侵略军的战略需要，曾经积极援助中国进行抗日战争，向国民政府提供了财政和物资援助，并且废除了在华治外法权。1943年11月，美、英两国首脑还邀请蒋介石出席开罗会议，共同协商对德、日作战的计划，并且发表了《开罗宣言》。由于中国军民英勇抗击日本侵略军，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当时成为世界四大强国之一，并且成为联合国发起国之一。

在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一方面把中国的抗日战争看作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一方面按照列宁主义的原则，坚持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解放运动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观点。于是，他曾经反复说明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关系。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专门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一节。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我们又是爱国主义者，我们的口号是为保卫祖国反对侵略者而战。对于我们，失败主义是罪恶，争取抗日胜利是责无旁贷的。因为只有为着保卫祖国而战才能打败侵略者，使民族得到解放。只有民族得到解放，才有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得到解放的可能。中国胜利了，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者被打倒了，同时也就是帮助了外国的人民。因此，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实施。为此理由，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发挥其全部的积极性，英勇坚决地走上民族解放战争的战场，拿枪口瞄准日本侵略者。”

毛泽东还说：“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看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之下来决定。有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爱国主义’，有我们的爱国主义。对于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所谓‘爱国主义’，共产党员是必须坚决地反对的。日本共产党人和德国共产党人都是他们国家的战争的失败主义者。用一切方法使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战争归于失败，就是日本人民和德国人民的利益；失败得越彻底，就越好。日本共产党人和德国共产党人都应该这样做，他们也正在这样做。这是因为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战争，不但是损害世界人民的，

也是损害其本国人民的。”

1933年3月30日，日军以数十倍于我的兵力，将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的前身抗日救国游击军围困于宁安地区马家屯子附近的孤独山上。经过异常激烈艰苦的战斗，游击军突围后，在嘎牙河下游大肚子川沟一片茂密的松林里，发现了一辆满载子弹的日本军车，又在附近的河边发现了一具日军士兵的尸体。尸体旁边，留有一张给中国抗日游击队的字条，上面写着这样的话：

亲爱的中国游击队的同志们：

我看到你们撒在山沟里的宣传品，知道你们是共产党的游击队。你们是爱国主义者，也是国际主义者。我很想和你们会面，同去打倒共同的敌人；但我被法西斯恶兽包围着，走投无路。我决心自杀了。我把我运来的10万发子弹赠送贵军。它藏在北面的松林里，请你们瞄准日本法西斯军射击。我虽身死，但革命精神长存。祝神圣的共产主义事业早日成功！

关东军间岛日本辎重队

日本共产党员伊田助男

1933年3月30日

抗日救国游击军的将士们为他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所深深感动，当即为他开了追悼会，将他的遗体 and 游击军烈士的遗体安葬在一处，为了永远纪念这位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献出年轻生命的国际主义战士，后来马家大屯小学被命名为“伊田小学”。

伊田助男等，及后来日本侵华军中以反战作为行动主旨的“觉醒联盟”以及“日本人解放同盟”（即“反战同盟”）的活动，证实了当时毛泽东所曾经说到的，“日本共产党人和德国共产党人都是他们国家的战争的失败主义者。用一切方法使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战争归于失败，就是日本人民和德国人民的利益；失败得越彻底，就越好。日本共产党人和德国共产党人都应该这样做，他们也正在这样做。”

有一位加拿大共产党党员，名叫诺尔曼·白求恩。他是一位著名的医生。1936年，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侵犯西班牙时，他曾经勇敢地亲赴前线，为反法西斯的西班牙人民服务。1937年，中国的抗日战争爆发，他又率领加拿大美国医疗队于1938年初来到中国，3月底到达延安。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曾经接见了白求恩，请他向支持中国抗战的加拿大朋友和美国朋友转致谢意。白求恩在日记中写道：我在那间没有陈设的窑洞里和毛泽东同志面对面地坐着，倾听着他那从容不迫的谈话的时候，我回想到长征，想到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怎样领导着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的长途跋涉，从南方到了西北山区的黄土地带，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毛泽东同志那样感动着每一个和他见面的人，这是一个巨人！他是我们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

白求恩不久赴晋察冀边区，在那里工作了1年多。毛泽东对他的生活和工作十分关心，他在给晋察冀边区司令员聂荣臻的电报中曾经指示：“请每月给白求恩同志一百元。”“同意任白求恩同志为军区卫生顾问。对其意见、能力完全信任。”白求恩在写给毛泽东的信中，感谢毛泽东对他的关心，他说：“我自己不需要钱，因为衣食一切均已供给。该款若系加拿大和美国汇给我私人的，请留作烟草费，专供伤员购制烟草及纸烟之用。”

白求恩的牺牲精神、工作热忱以及责任心，都使当地抗日军民深为感动。因为在一次为八路军伤员进行急救手术时受感染，他不存于1939年11月12日在河北唐县逝世。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还紧握住身边同志的手，深情

地说：“请转告毛主席，感谢他和中国共产党给我的帮助。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一定会获得解放。”

12月21日，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纪念白求恩》一文。这篇文章不仅在当时有相当大的影响，直到几十年之后，仍然在全党和全国人民心中产生过深刻的感染力。

毛泽东说：“白求恩同志是加拿大共产党员，五十多岁了，为了中国的抗日战争，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去年春上到延安，后来到五台山工作，不幸以身殉职。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

他在这篇文章中接着写道：“列宁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要拥护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无产阶级要拥护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世界革命才能胜利。白求恩同志是实践了这一条列宁主义路线的。我们中国共产党员也要实践这一条路线。我们要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要和日本的、英国的、美国的、德国的、意大利的以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能打倒帝国主义，解放我们的民族和人民，解放世界的民族和人民，这就是我们的国际主义，这就是我们用以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的国际主义。”

在抗日战争中，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曾经给了中国人民许多援助，美国、英国以及一些其他国家，也给了中国人民许多援助。对于这些援助，毛泽东都曾经给以肯定的评价，表示衷心的感谢。毛泽东在1941年6月23日为中共中央写的对党内的指示中，提出建立“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的口号，他提出，在外交上，应当“同英美及其他国家一切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统治者的人们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

1944年7月，美国罗斯福总统有意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力量直接接触，由美国驻华使馆和驻华美军司令部组织了一个美军观察小组到达延安。美国大使赫尔利也曾经在1944年11月抵达延安。1945年1月，毛泽东和周恩来还曾经试图通过当时在延安的美军观察小组与美国政府取得联系，要求秘密飞往华盛顿和美国总统罗斯福进行直接会谈。不过，这一信息在美方传递过程中出现差误，以致使得这一重要会见因为美方的障碍而没有能够实现。

一些当代美国历史学家在研究这一阶段的美中关系史时，曾经分析说，假设当时毛泽东华盛顿之行的设想如果得以实现，罗斯福总统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认识或许就会有所转变，美国的对华政策或许也会出现某种变化，美国也许就不会在后来卷入一场支持必然失败者的战争，后来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错误，或许也有可能避免。

这样的认识，可能是有一定道理的。

另一方面，毛泽东秘密访美的计划如果当时能够实现，他对于西方国家政治制度和经济水平的认识，也就有了直接的感性经验的基础，这对于中国迈向现代化的进程，应当也是有益的。

四、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在延安东南百余里，有一处山穷水恶的贫瘠土地，叫作“南泥湾”。南泥湾当时是延安县金盆湾区的一个乡，是几乎没有人烟的野山荒原。然而，从一批抗日军人按照毛泽东的指示进入这片土地之后，彻底改变了它的面貌。正像一首人们都十分熟悉的歌中所唱的：

如今的南泥湾，
与往年不一般；
遍地是庄稼，
到处是牛羊。

……

再不是旧模样，
是陕北的好江南。

当时担负保卫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任务的八路军 120 师 359 旅，是 1940 年底至 1942 年春陆续开赴临镇、金盆湾、南泥湾、九龙泉地区执行屯垦任务的。

在日、伪、国民党顽固势力的夹击下，又由于连年遭受严重的旱灾、水灾和虫灾的侵袭，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经济形势困难重重。

毛泽东在谈到当时的困难情形时，曾经这样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但是我们渡过了困难。这不但是由于边区人民给了我们粮食吃，尤其是由于我们下决心自己动手，建立了自己的公营经济。边区政府办了的许多的自给工业；军队进行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发展了以自给为目标的农工商业；几万机关学校人员，也发展了同样的自给经济。”“我们就用这些办法战胜了困难。”

359 旅以南泥湾地区为中心垦荒屯田，开展以农业为主的生产运动，正是毛泽东所说的“军队进行”“大规模的生产运动”的成功典范。

1943 年，359 旅的大生产运动达到了最高潮。当时提出了“不让一个人站在生产战线之外”的口号，上自旅长，下至各种勤杂务人员，一律参加生产。单位之间和个人之间，展开了热火朝天的劳动竞赛，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日开荒纪录不断刷新。边区特等劳动英雄赵占奎创造了日开荒 4 亩 1 分地的成绩。他所在的 718 团 2 营 5 连，共 75 人，耕种 1500 亩土地，收获小米 320 石，其他谷物和豆类 49 石，平均每人收粮 4 石 4 斗多。收获各种蔬菜 5 万 3 千多斤，平均每人超过 7 百斤。

1943 年 7 月 10 日，朱德到南泥湾地区视察，高兴地赋诗赞扬 359 旅生产自给的成绩：

去年初到此，遍地皆荒草。
夜无宿营地，破窑亦难找。
今辟新市场，洞房满山腰。
平川种嘉禾，水田栽新稻。
屯田仅告成，战士粗温饱。
农场牛羊肥，马兰造纸俏。

就在上个月，毛泽东也前来南泥湾视察。他看到荒川野岭变成陕北江南

的情景，兴奋地赞扬指战员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他说：“困难，并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大家动手征服它，它就低头了。大家自力更生，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了。目前我们没有外援，假定将来有了外援，也还是要以自力更生为主。”

毛泽东来到 359 旅通信连，他看到一孔孔新开的窑洞刷得雪白，问石灰是从哪里来的。旅长王震答道，是从山里取石头自己烧的。毛泽东又问窑洞里的桌子是不是战士自己做的。王震回答说，全是自己做的。毛泽东随手又拿起桌上的一个学习笔记本，看了看上面写的字，摸了摸“纸”的厚度，笑着说道：这是桦树皮吧？看，倒真像纸哩！王震说，同志们都叫它不花钱的油光纸。毛泽东高兴地说：你们这里什么都不花钱，同志们靠自己的双手，创造了一切。

359 旅的同志汇报说，我们今年做到了全部经费、物资自给，没有领公家一粒米、一寸布、一分钱，除了丰衣足食，我们每年还向政府上缴一万石公粮。

毛泽东听了，高兴地连声赞扬他们“干得好”，并且说：“我们八路军不仅会打仗，还会搞建设，南泥湾不是搞得很好吗！”

有一次，毛泽东在会见几位部队领导同志时，听说战士们对“丰衣足食”的口号兴趣很大，他说道，有兴趣就好，不过，不要片面讲“丰衣足食”，讲“丰衣足食”，还得讲艰苦奋斗，没有艰苦奋斗，哪有“丰衣足食”？“丰衣足食”是不能从天上掉下来的。

毛泽东还说，蒋介石净做坏事，但他不给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发饷，倒算是做了件好事。我们经济上受到了封锁，我们少了几十万块饷钱，使原来对蒋介石还有点幻想的人，不再幻想了。应该感谢这位委员长，他使我们找到了“自己动手”的道路，这比任何饷，任何援助都可靠。

当时，在延安的党、政、军、学各界数万人都参加了大生产运动。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当时都亲自参加了生产劳动。在延安枣园曾经举行了边区军民纺线比赛。在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参加的比赛中，周恩来同志和任弼时同志还获得了“纺线能手”的称号。

毛泽东也分了 1 亩荒地，他亲自挖地，分畦，上粪，种上了一些谷物以及辣椒和西红柿等蔬菜。

来杨家岭毛泽东的窑洞和他谈工作的同志，许多都曾经尝到过坡下那片毛泽东亲自耕种的菜地里出产的蔬菜。

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杨步浩看到毛泽东亲自耕种农田的情形，不愿意指挥解放区军民抗战的最高统帅把时间和精力花费在粗重的农活上，主动提出为毛泽东“三代”——代耕、代种、代交公粮。他另开了 1 亩荒地，细心地耕种，麦收之后，立即挑来了 300 斤晒干扬净的小麦，完成了第一年的“三代”任务。

毛泽东感谢他的帮助，领他到自己经营的地头，观赏自己种的玉米、黄豆、辣椒和西红柿，还随手摘了两筐西红柿，送给杨步浩作为礼品。

1942 年 6 月，斯大林曾经派飞机送医务人员到延安，并且给毛泽东带来了一封信，以及 10 件皮大衣、10 双长筒皮靴、10 条毛毯，和一些皮鞋和纸烟。毛泽东对来帮助中国抗战的苏联同志表示欢迎，在送别客人时，他只留下了 1 双皮鞋和 1 箱纸烟，其余的礼品部分给其他的同志了。第二天，当飞机返航时，毛泽东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又让人缝了一个小布袋，装上了一

些他亲手种的红辣椒。毛泽东微笑着说：延安这里，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我就给斯大林同志送这点礼品，表示我的谢意吧！

毛泽东送给斯大林的红辣椒虽然价值微薄，但是这些由他亲手种植、收获，生长在陕北黄土地上的农产品，却是体现以他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抗日军民不怕任何困难，决心把反法西斯战争进行到底的坚强意志的一种象征。

大生产运动是表现出抗日军民奋斗精神的一曲胜利的凯歌。

大生产运动不仅支持了敌后的艰苦抗战，而且使中国共产党初步积累了一些经济建设的经验，培养出了一批经济建设的管理人才。

1939年5月20日，毛泽东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曾经说过，我们发起的生产运动应当“是永久性的”。他说，生产是为的要吃饭，吃饭是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子子孙孙都需要的，所以生产运动是永久性的。毛泽东浅显的语言，其实说明了非常重要的大道理。如果我们从这样的角度认识抗日战争中大生产运动的意义，可能是比较符合历史实际的。

五、青年运动的方向

诗人萧三曾经在《“窑洞城”》一文中记述了他在1939年4月前往延安时的一些见闻。

他写道，他和邓小平等一行人乘卡车由西安往延安行进，已经是第三天，在快到达洛川的路上，“看见大约有80多个青年男女，背着背包，往北方走去。他们都是到延安去进抗大的。”“这两年以来，成千上万的青年从全国各地奔赴延安。”他们看到有两名新四军介绍来的青年女子，步行到洛阳，从洛阳乘车到西安，“由西安又走路去延安，她们已经走了8天，两脚都起了泡。”

萧三接着又写道，“延安—陕甘宁边区是个地瘠民贫的地方，但同时又是全国人民一心向往的革命圣地。多少爱国的、有进步思想的男女青年从全中国各个角落。从海外，经过千山万水，度过无数难关，奔向延安来！延安就是一座熔炉，在这里成千上万的人受到革命思想、革命教育的锻炼，成为抗日战争、新民主主义革命乃至解放战争、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骨干。”

在萧三《“窑洞城”》中的《说“窑洞”》一节，我们还可以看到这样的记述，“许多新成立的工作机关，革命学校，都设在延安。成千上万的青年奔来延安，入‘抗大’（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陕公’（陕北公学）、‘鲁艺’（鲁迅艺术文学院）、‘女大’（中共女子大学）学习。”“‘抗大’就是由来学习的学生自己挖窑洞建设成的。许多外面来的知识分子从修建窑洞而得到锻炼是很有意义的。没有教室，起初在露天下讲课，一块砖、一个石头就是座位，双膝就是课桌。一块木板糊层锅底灰，就是黑板。白的小石子、小土块就是粉笔。慢慢地，这些东西都齐备了，木制的教具也有了。不过一时不能齐备。”

对于满怀革命理想和抗日热忱的青年，毛泽东给予了热情的关怀。同时，他也及时指出了青年要走上革命道路应当注意的一个方向性问题。

1939年5月1日，毛泽东为延安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写了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的文章《五四运动》。毛泽东写道，“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然而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毛泽东同时还明确指出：“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真正的革命者必定是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的。”

三天后，5月4日，毛泽东在抗大第五大队的坪场上举行的延安青年群众五四运动20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了重要的讲演。毛泽东在讲演中继续发挥了他提出的知识分子必须和工农民众相结合的思想。他说道：“‘五四’以来，中国青年们起了什么作用呢？起了某种先锋队的作用。”“什么叫做先锋队的作用？就是带头作用，就是站在革命队伍的前头。”毛泽东说，由中国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组成的几百万人的军队，是反帝反封建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军。“但是光靠这个方面军是不够的，光靠了它是不能打败敌人的，因为它还不是主力军。主力军是谁呢？就是工农大众。中国的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一定要到工农群众中去，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没有工农这个主力军，单靠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这支军队，要达到反帝反封建的胜利，是做不到的。”

毛泽东鼓励全国的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们，应当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

在一块，和他们变为一体。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一支几万万人的强有力的军队。而有了这支大军，才能攻破敌人的坚固阵地，才能攻破敌人的最后堡垒。

毛泽东再次重复了在《五四运动》一文中提出的判别革命的还是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的唯一的标准，是“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他说：“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他今天把自己结合于工农群众，他今天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结合了，或者反过来压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了。”

这一篇重要的讲演，后来以《青年运动的方向》为题，收入到《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中。

毛泽东号召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指明了青年走向革命、走向进步的“光明的前途”。

许许多多的延安青年，正是以毛泽东提出的这一思想为指针，完成了自身革命化的过程，并且成为革命力量的中坚的。

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中国抗击日本侵略并且推进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力量，也正是通过这一过程，得到了新的生力军。

在抗日战争正在进行的1942年5月，延安召开了一次对文艺界形成重要影响的会议，这就是延安文艺座谈会。

这次会议主要解决了文艺工作怎样更好地和抗日战争相结合的问题。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作了两次重要的讲话。

在5月2日的讲话中，毛泽东提出，文艺工作的对象是工农兵及其干部，文艺工作者应当了解他们，熟悉他们。毛泽东说，“许多同志爱说‘大众化’，但是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毛泽东还结合自己作为知识青年走向工农的历程，对于这种感情变化，作了生动的说明。

毛泽东说，“你要群众了解你，你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就得下决心，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在这里，我可以说一说我自己感情变化的经验。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这样的情感倾向，到后来才有所改变。

毛泽东接着说，“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了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都干净。”

对于这种变化，毛泽东总结说，“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他认为，这种变化的意义其实是十分重要的。“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

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变化”和“改造”，后来有僵化的片面的理解，因而产生过一些负效应。但是在当时，毛泽东的讲话对于走向抗日战争火热生活的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确实曾经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从莫斯科大学毕业回到延安，毛泽东对他说，你在苏联的大学毕业了，但学的只是书本上的知识，只是知识的一半。这是不完全的。你还需要上另一个大学，这个大学中国过去没有，外国也没有，这就是“劳动大学”。在这个大学里可以学到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

毛岸英立即答应去上这所“劳动大学”。

“上哪个‘劳动大学’？”人们好奇地问道。

毛岸英说，父亲决定，让我到农村去参加劳动，从开荒下种一直到收打完才回来。还要自带行李、口粮和种子……。

不几天，他就高高兴兴地背着被子、小米、菜籽，到吴家枣园上“劳动大学”了。

毛岸英身穿毛泽东的一件打着补丁的灰布旧衣，头上扎一条白羊肚手巾，和农民一起犁地、点籽、上粪。他不但学会了各种农活，更重要的是和普通劳动者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也增加了对中国社会的基本认识。

毛泽东送自己的儿子上“劳动大学”的故事，说明他对于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要和劳动人民打成一片的主张，是出于一种真诚的认识。

六、革新内政，树立民主政治

1945年7月4日，在延安的一孔普通的窑洞里，毛泽东和著名党外民主人士，作为国民参议员来访的黄炎培进行了亲密的长谈。

毛泽东问黄炎培这次来延安考察有什么感受。

黄炎培回顾了自己所经历的中国数十年来立场不同的政治力量成败兴亡的历史，深切地感叹道，“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而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渐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薄弱了。”

接着，他又总结说，“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

黄炎培又说道，“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

他的意思，是说许多政治人物、许多政党、许多政治力量，都没有能够跳出由盛而衰，由强而弱，由积极到消极，由进取到保守的“周期”循环的规律。中国共产党寻求破除这种“周期率”的新途径，不知道有没有新的进展。

毛泽东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

他满怀信心地接着说道：“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点了点头，用赞许的口气说道：“这话是对的，只有把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个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个地方的人，才能使得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这是一次非常著名的对话。毛泽东和党外民主人士关于“民主”的见解，自然未必完全相同。毛泽东也不一定完全同意黄炎培关于所谓“个人功业欲”的认识。然而这次对话告诉人们，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战事业取得空前胜利的时候，已经考虑到了如何寻找“新路”以求“跳出”由兴而衰的历史“周期率”的问题。

从以后历史发展的进程看，毛泽东后来所更为注重的，可能并不是他当时所谓“用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而是试图引导全党以不断进取的历史实践来保持自身的活力。

但是，在当时，在抗日战争期间，在延安时代，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确实是十分重视民主建设，期望以民主的方式争取最大多数人民的拥护的。

当时，中国共产党在各抗日民主根据地进行政权建设时实行的基本政策，是讲求民主，基层政权由民主选举产生，政府的构成，实行“三三制”的制度，也就是在政府工作人员中，共产党员、非党左派进步分子、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中共中央发布的指示要求，在政权工作中，要不断健全民主

制度，党员必须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倾听他们的意见，遇事共同商量，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毛泽东在1940年3月6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时，题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其中明确说道：“必须教育担任政权工作的党员，克服他们不愿和不惯同党外人士合作的狭隘性，提倡民主作风，遇事先和党外人士商量，取得多数同意，然后去做。同时，尽量地鼓励党外人士对各种问题提出意见，并倾听他们的意见。绝不能以为我们有军队和政权在手，一切都要无条件地照我们的决定去做。”

当时，中国共产党对全国政治形势的要求，也强调民主建设。1940年1月2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中，就有这样一条：“革新政治，开展宪政运动，树立民主政治。”

宪政，是孙中山先生提出的政治纲领中的内容。他曾经设想建立民国的政治程序应当有三个阶段，这就是：1.军政，2.训政，3.宪政。宪政，原本是指依据宪法和法律进行治理的政治制度。毛泽东曾经说，“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政治。”他强调，“把独立和民主合起来，就是民主的抗日，或叫抗日的民主。没有民主，抗日是要失败的。没有民主，抗日就抗不下去。有了民主，则抗他十年八年，我们也一定会胜利。”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时代，是特别注意发扬民主作风，注意倾听人民心声的。

在当时，他们还十分注意接受来自普通民众的批评意见。

有一位军分区司令员，不小心踩了农民的菜地。菜地的主人怒气难平，在整风的时候为这件事向这位司令员提了意见。

这位司令员听了很不入耳。他不仅不自责，还埋怨地方党政负责人没有教育好那位农民。他的怨言传到了毛泽东那里，他说：“老百姓对我们有意见，动不动就说‘找毛主席评理去’，今后的事怎么办呢？”

毛泽东听了大笑起来，他说服了这位司令员，还多次在公开场合对这件事发表评论：

“在我们陕甘宁边区，有一家老百姓，给当地的一个分区司令员提了批评意见，你们听说没有？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我看是天大的好事。它说明这个老百姓很有觉悟嘛！”

毛泽东又接着说道：“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但都是老百姓受官府的气，受当兵的气。他们只有忍受，从来敢怒不敢言，如今，陕甘宁边区上上下下都讲民主，这位老百姓有意见才敢向司令员提，才敢批评这位‘长官’，你们看这有多好啊！”

毛泽东还说，“你们想知道这位司令员后来怎么样了吗？他放下了架子，诚恳地向这位老百姓作了检讨。这样，军民关系、军政关系不就好了嘛，军民、军政不就团结了嘛！”

陕北清涧的一个农家妇女，丈夫因雷击死亡，家庭负担沉重，心情恶劣，曾经大骂“世道不好”，共产党“黑暗”，毛泽东领导“官僚横行”等，于是被逮捕押送到延安。保卫部门的意见是要判刑。

“不能这么做嘛！”毛泽东知道后表示，“打骂之事，是民间常见的，大部分是因气盛所致。为什么生气？人家死了人，出了事嘛！迷信不可信，还是个教育和认识问题。”

他吩咐把那个农妇带来。毛泽东对她遭遇的不幸表示同情。那位妇女深

感内疚，跪倒在毛泽东面前，说：“毛主席，咱不好哩……咱不应骂政府哩……咱犯了大罪嘛……，您就枪……毙咱……”

毛泽东双手扶起她，说道：“妹子，你不用难过嘛！也不要这样哟，我们不会枪毙你的。我已经批评了清涧的地方干部，也批评了延安的执法部门。老百姓有具体困难，不予解决就该挨骂嘛！你骂了政府，被捉来了。我今天同你像亲姐妹兄弟一样谈谈，你不用害怕，要对我讲真心话：究竟有什么困难才骂政府呀？”

那位农妇一五一十陈述了自己的困难，她还说道，“这两年，村的官，乡的官，县的官，都不管咱的死活嘛！要公粮，还骂咱男人，连老娘也骂哩！”

毛泽东听说基层干部不解决困难户的具体问题，逼索公粮，甚至辱骂村民，他们根本不到农民家里调查具体的经济情况，农民有事，要卖羊沽酒买肉才能把他们请来，不禁怒火中烧。他吩咐马上释放这位妇女，并且派人护送她回家，又吩咐：“记住，去清涧的人，带上公文，讲明这位同志没有什么罪过，这是个好人，是个敢于讲真话，为我们共产党和革命政府提了良好愿望和意见的好同志！要对当地政府讲明，对她家实行具体的特别照顾。”

毛泽东接着又说道：“同时，清涧的公粮问题，社会调查部和边区政府要做一次认真调查研究，该免的要免，该减的要减，不能搞国民党反动派那一套：搜刮民财，不管老百姓死活！还有，社会调查部要根据这次捕人甚至妄杀无辜，作出深刻反省。我们的组织、干部部门，也要对现行的村以上当权的官员，进行一次审检，把不胜任的，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撤换下来。”

七、延安的窑洞是最革命的

在陕北，在瓦窑堡（今陕西子长）田家院，在保安（今陕西志丹）县城，在洛川冯家村，在延安凤凰山、杨家岭、枣园，许多地方都还保留着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期间曾经住过的窑洞。

窑洞是一种利用黄土的特性，就山崖挖成的作为住屋的土洞。窑洞是长年居住在黄土高原的人民因地制宜建造的住宅。一排排的窑洞，成为当地最普遍的、具有自然地理特色的人文景观。

陕北的土窑洞，可以看作反映当地民风民情的最典型的象征之一。

在延安时代，毛泽东通常都在窑洞里读书、写作、举行会议、研究工作。

毛泽东还经常在窑洞里接见从前方回到延安和即将从延安出发前往敌后的干部。

有一次，他在接见从前方回来的干部时说：“你们刚从前方回到延安，你们要习惯住延安的窑洞。延安的窑洞是最革命的，有马克思主义，能指挥抗日战争的胜利，全国人民把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也就是寄托在延安的窑洞里，你们要看得起延安的窑洞啊！”

在这种普通的窑洞里，当时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和大地母亲——广大的人民群众保持着最密切的联系。

当时，毛泽东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他和大家一样，每天3钱盐、5钱油，吃的是小米，穿的是粗布衣服。许多同志多次提议给毛泽东增加伙食费，都被他坚决谢绝了。他说，“我身为中央领导人，更应该以身作则，遵守规章制度，决不能搞特殊化。”

美国著名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前往延安访问毛泽东之后，曾经在访问记中这样写道：“党的负责干部住着寒冷的窑洞，凭借着微弱的灯光，长时间地工作。那里没有讲究的陈设，很少物质享受，但是有着头脑敏锐，思想深刻和具有世界眼光的人。”

当她和毛泽东谈话时，发现山坡上有几个放牛的小孩好奇地偷看她。斯特朗问道：“那些孩子们在干什么？”毛泽东回答说：“那是另外一家，他们的孩子对我家的外国客人感到很新鲜。”

斯特朗高兴地向那些小孩子招手致意。她顿时感到，在这个极其平凡的山村里，毛泽东只是这些普通居民的友好的邻居。她后来写道：“我很少见到一个人如此愉快而随和地习惯于他的环境。毛泽东所需要的宁静是由邻居对他的尊敬中得到的。”

以美国驻华海军情报官员的身份访问延安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上尉卡尔逊，在1938年5月5日来到延安，他被安排住在白求恩大夫曾经住过的窑洞里。

卡尔逊这样回忆当时在毛泽东的窑洞里会见他的情形：

“一支蜡烛的黯淡灯光照着毛泽东工作的房间，房中陈设简朴。一盘炕，一张木桌和几架书，也许最重要的是毛泽东的那种神态，表现了另一个世界的品格气氛。”

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也曾经这样记述她在延安的窑洞里会见毛泽东时，对毛泽东的工作风格得到的深刻印象：

“在我1937年抵达延安并且会见朱德的同一个值得纪念的晚上，我拜访了毛泽东。由于他晚上工作白天睡觉，我在午夜去访问他。掀开一个棉门帘，

进入一个黑洞。洞中阴沉黑暗，中间一张粗糙的桌子上，点着一根长蜡烛，照耀着成堆的书籍和纸张，也照耀着上面的低矮的泥土天花板。隐约可见一个男人站立的身影，他一只手按在桌子上，脸孔朝着门口，给阴影遮着。我看到一团黑色的衣物上覆盖着一件摊开的棉大衣。他站在泥土地面的一块隆起的地方，身材显得更高大。黑暗的洞窟中只点燃一根孤零零的蜡烛，使这里的景象具有一种深沉的美，好像一部经久褪了色的古书。”

在窑洞这种古老的简陋的住居形式中，毛泽东经历了抗日战争的整个过程，领导了这一规模宏大的胜利的人民战争。

应当说，毛泽东在他的一生中，正是在延安的窑洞里，曾经保持了最旺盛的革命激情和最坚韧的革命毅力，保持了艰苦奋斗的革命作风，保持了和人民大众的最亲密的联系。

中央警卫团战士张思德，是一位经历过长征的1933年参加革命的共产党员，是一位忠实为人民服务的好同志。1944年9月5日，他在陕北安塞山中烧炭，因为炭窑意外崩塌而不幸牺牲。9月8日，在延安枣园沟口的操场上，隆重举行张思德同志追悼大会。

毛泽东亲自参加了追悼大会，他亲手把花圈安放在烈士遗像前。花圈上有他致的挽词：“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毛泽东并且走上讲台，作了题为《为人民服务》的著名讲演。

毛泽东说，“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

他又说道：“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的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的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毛泽东接着又说道：“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

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就是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始终保持着新生的活力，始终背靠着民众的支持，从而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取得了人民战争一个又一个的胜利的。

1939年3月15日，毛泽东在延安凤凰山的窑洞里会见了印度援华医疗队的成员们。他用盛在大盆里的小米饭和蘑菇、竹笋等菜肴招待这些代表印度人民来帮助中国抗日战争的医务人员。毛泽东满怀信心地说：“吃小米拿步枪，我们坚信能够抗击军事强大的日本。”

1944年11月8日和9日，毛泽东在枣园自己的窑洞里会见了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后来任美国驻华大使的赫尔利。12月8日，又会见了赫尔利派来的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毛泽东对于美国支持国民党，要求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军民接受国民党提出的政治条件的立场，给予了坚决的批评。他最后对包瑞德说，“请回去告诉你们的总统和赫尔利先生，你们吃饱了面包，睡足了觉，要骂人，要撑蒋介石的腰，这是你们美国人的事，

我们不干涉。你们有面包加大炮，我们有的是小米加步枪。你们愿拍蒋介石多久的马屁，就拍多久。不过请你们记住：中国是中国人民的，绝不是蒋介石的。”

后来的历史，证明了毛泽东的话。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用“小米加步枪”，战胜了拥有最先进的武器装备的反人民的力量。

实现这一历史进步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当时与人民保持了紧密的联系。

